不断地被皇家搜罗召用，为宫廷艺术输入新鲜血液。同时，文人、贵胄对绘画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，除了热心收藏鉴赏外，愈来愈多的人挥毫作画，邓椿《画继》中即收入侯王贵戚画家13人，轩冕才贤、岩穴上士、缙绅韦布身份的画家竟达68人之多，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潮流。文人士大夫画崭露头角，与民间和宫廷艺术形成碰撞和互补的格局，并且对皇室贵胄阶层的绘画产生影响，从而使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和转移。作为画家的赵佶，既有着贵族的身份，又受到士大夫文化的薰染，其绘画综合体现着这两方面的情趣特色。

关于赵佶墨笔花鸟的渊源，笔者认为不可忽视两方面的影响：一为五代兴起的以徐熙为代表的江南花鸟画派；二为宋代中叶日渐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。

从文献上考察，墨笔花鸟画从五代时期便已渐渐兴起，首开其端者为五代江南地区的徐熙。他以处士身份徉游园圃，志节高迈，放达不羁，其画不以“傅色细碎为功”而重视“落墨”，用笔自然无拘，不作谨细的描摹，他擅画田园花果，抒其高旷之情怀，于唐代以来赋色浓艳、用笔谨细的画风之外另辟蹊径，有“徐熙野逸”之称，宋人亦谓之“江南落墨”。宋初宫廷画院虽曾以黄筌的富贵体为标准，但徐熙画风并未完全受到摈弃，宋太宗即称赞“花果之妙，吾独知有熙矣，其余不足观也”，并“遍示画臣俾为标准”[1]。徐熙的作品在北宋末的宫廷收藏中达249件，《宣和画谱》中给以“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”的评价。许多文人鉴赏家对徐熙的评价也高于黄氏，最晚成书于仁宗时期的《圣朝名画评》中，论及花鸟画谓“（黄）筌神而不妙，（赵）昌妙而不神，神妙俱完，舍熙无矣”，“宜乎为天下冠也”；郭若虚评徐熙为“学穷造化，意出古今”[2]；米芾认为“黄筌画不足收，易摹；徐熙画不可摹”[3]，都对徐氏的艺术推崇备至。

此种江南花鸟画风，“翎毛形骨贵轻秀”，“骨气多不及蜀人，而潇洒过之”[4]，其图绘野情野趣、自然抒情的风格受到人们的喜爱。可以说，北宋时期的花鸟画创作在徐熙的影响下产生了不少名家。如仁宗、神宗之际颇享盛名的画家崔白，来自于地属江淮以南的濠梁，善画败荷凫雁、芦汀苇岸、风鸳雪雁野逸之趣，他用笔潇洒自如而不刻板细谨，神宗时被召入画院，进一步打破了黄家富贵体在宫廷中的垄断地位。

北宋江南地区花鸟的另一重要发展表现在画僧慧崇开创的集山水、花鸟为一体的小景画，富有诗意地图绘沙汀凫鸭、烟雨芦雁等景趣，得意于荒寒平远、潇洒虚旷之象。

[1] 宋 刘道醇：《圣朝名画评》卷三。

[2] 宋 郭若虚：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四。

[3] 宋 米芾：《画史》。

[4] 宋 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一“论徐黄体异”。